

北洋軍閥 統治時期史話

第一册

陶 菊 隱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洋軍閥 統治時期史話

第一册

辛亥革命前后和第一次南北战争时期
(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三年)

陶菊隐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第一册

陶菊隐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44,000 字

1957年3月第1版 1978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 11002·59 定价 0.44 元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

第一冊

辛亥革命前后和第一次南北戰爭時期
(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三年)

目 次

第一章	北洋軍閥的醞釀和產生	1
一	北洋軍閥醞釀和產生的時代背景	1
二	袁世凱小姑練兵，袁手下的“北洋三傑”	5
三	袁出賣君主立憲派取得西太后的信任	8
四	袁鎮壓義和團取得帝國主義的寵愛；袁在調升直隸總督后用盡心機擴大北洋軍	11
五	滿族少年亲貴對袁的猜忌；袁在彰德秋操后被迫交還北洋四鎮的統率權	15
六	北洋派的附屬軍——東三省和兩廣的軍事派別	18
七	另一軍事派別——日本士官系	22
第二章	辛亥革命的前夜	29
一	興中會與華興會合併成立同盟會；萍醴起義失敗；日本政府與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同盟會出境	29
二	清政府出賣憲政的假資本，梁啟超“借尸還魂”，袁世凱偽裝同情立憲運動	32
三	攝政王載灃放逐袁世凱，皇室總攬兵權的新措施	35
四	清政府于被迫宣布九年立憲后又被迫縮短期限為五年；君主立憲派利用各省諮詢局進行合法	

斗争；挂羊头卖狗肉的皇族内閣出現；君主立宪派的最后請願受到“严旨申斥”	38
五 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四国銀行团成立的經過	41
六 風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四川官吏下令屠杀和平請願的人民	47
第三章 武昌起义后各省紛紛响应	54
一 武汉方面的革命秘密活动，湖北官方破获秘密机关多起	54
二 工兵营首先發难，黎元洪被推为鄂軍都督，革命軍炮击楚豫兵艦	57
三 湖南宣布独立，焦、陈两都督被野心家杀害，君主立宪派譚延闔繼任湘軍都督	62
四 各省紛紛宣布独立，某些省区半独立和假独立的怪現象	66
第四章 袁世凱利用时机重登政治舞台	74
一 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为湖广总督，袁向清政府提出六个条件	74
二 袁向革命軍进行第一次和平試探，黃兴到汉口指揮軍事	77
三 第二十鎮在灤州举行“兵諫”，惊慌失措的清政府被迫宣布宪法信条十九条，袁南下到孝感視師	80
四 可耻的政治陰謀血案——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在石家庄被刺身死	82
五 袁到北京組織責任內閣；袁用手腕夺取皇族的兵权；載豐解除摄政，汪兆銘受袁收买	85
六 革命軍退出汉口、汉陽，袁向革命軍进行第二次和平試探	87
七 革命軍苏浙滬联軍攻下南京	90

第五章	袁世凯通过帝国主义进行南北和谈	94
一	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代表会议对袁的幻想；袁通过英国向革命军提出和平方案	94
二	留沪各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孙中山回国后当选临时总统	96
三	袁世凯速和速决的心理；革命军方面和平妥协派占居优势	99
四	日本利用中国内战出兵中国的阴谋，美国采取观望态度，英国积极地进行换一个工具的工作	101
第六章	南北和议的成立和两个临时政府的并立	106
一	南北代表在上海进行和议，北方总代表唐绍仪被迫辞职	106
二	袁在北京被刺；清贵族良弼被炸身死	110
三	北方暴动事件的先后失败，汪兆铭依照袁的意旨破坏北方各革命党团	114
四	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五色国旗，清帝宣布退位；南北两个临时政府的并立	118
五	孙中山推荐袁继任临时总统，袁不肯南下就职；北京发生兵变，临时参议院同意袁在北京就职	123
六	临时约法公布，唐绍仪组织民国的第一届内阁；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127
第七章	假统一与假和平的短暂时期	132
一	“混合内阁”倒台，“超然内阁”难产；袁第一次使用武力威胁临时参议院通过内阁的补充名单	132
二	又一次政治阴谋血案，黎元洪做了袁的政治俘虏	137
三	同盟会合并四小党改组为国民党；君主立宪派组织共和党、进步党与国民党对抗	142
四	袁发表“四巨头”联合宣言；荒谬绝伦的“政党	

	内阁”出现	147
第八章	袁世凯武力统一政策的准备时期	154
一	又一次震动全国的政治阴谋血案——袁指使 流氓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154
二	国民党对宋案主张法律解决,赵秉钧因刺宋嫌 疑被法院票传,袁制造“血光团”事件陷害黄兴	160
三	帝国主义垄断对华借款的毒辣手段	164
四	五国银行团大借款成立,段祺瑞的“战时内阁” 出现.....	168
五	帝国主义积极支持袁的武力统一政策,进步党 完全成为袁的御用党,黎元洪和章太炎成为袁 的有力工具.....	174
第九章	国民党讨袁战争的彻底失败	180
一	袁世凯调兵遣将,黎元洪向袁表示“忠诚”;国 民党主张对袁进行合法斗争,袁下令罢免国民 党系三都督.....	180
二	北洋军分两路南下,江西、江苏两省组织讨袁 军,上海领事团签字协约国民党首要人物.....	184
三	各省讨袁军先后失败,北洋军源源进入南方各 省.....	188
四	南京三次独立的经过,南京人民的罢市运动	190
五	军事胜利是袁走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195
第十章	战胜国民党后袁世凯排除异己的种种 措施	203
一	用外交压力撤换了江苏都督张勋.....	203
二	用军事压力罢免了福建、安徽、湖南等省都督	205
三	对云南都督蔡锷、浙江都督朱瑞采取了两种不 同的手段	206
四	用“霸王请客”的硬工调动了湖北都督黎元洪.....	209

第一章 北洋军阀的酝酿和产生

一 北洋军阀酝酿和产生的时代背景

北洋派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往开来、臭名昭彰的一个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它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卖国家和反人民的罪恶事业，又替蒋介石匪帮提供了军事独裁的可耻榜样。中国在它的黑暗统治下达十七年之久。它的长期统治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严重灾难，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化。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和革命斗争。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就是在这个时期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北洋派的创立者袁世凯在清政府政治腐败透顶、新旧两派对立、外患严重和全国各方面迫切要求御侮救亡的情况下，用卑鄙逢迎和阴险狠毒的手段，骗取清朝当权人物的信任，从而取得训练“新军”的职权，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使他的力量获得巩固和发展。辛亥革命爆发时期，他得到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利用民主革命派的软弱性与妥协性，采取“和平谈判”的欺骗手段，窃取了政权。随后他又利用民初国民党内部的不统一与不纯洁，在出卖国家利益交换帝国主义的政治大借款之后，发动了第一次南北战争，驱逐国民党而独霸天下。

历史不能分割。要了解北洋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必须从清政府后期西方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开始对清政府给以沉重的打击，而在清政府完全就范之后，又转而利用清政府

作为間接統治中国人民的工具的一个时期說起。

一八四〇年，英國侵略者对中国發动了肮脏的鴉片战争，打进了中国門戶，展开了資本主义列强掠夺中国資源、奴役中国人民的序幕。此后，接連發生了一八五六年英軍攻打广州事件，一八五八年英法联軍占領广州及天津事件，一八五九年英法联軍进犯大沽口事件，一八六〇年英法联軍攻陷北京、焚毀圓明园事件，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以及一九〇〇年八国联軍占領北京事件。这些战争和暴行，一次又一次地暴露了这批文明强盜的本来面目和清政府的腐朽無能，从而推动了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正义斗争。

帝国主义能够打敗腐朽的清政府，但是打不敗英勇的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門戶的那一天起，中国人民就已开始了前赴后繼的、各种形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随着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而日益發展。

一八五〇年，中国南部崛起的太平天国起义軍，很快地推进到长江流域和淮河以北。太平天国虽然在一八六四年被国内外联合起来的反动势力所消灭，但是它严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威信，并且加深了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一九〇〇年，帝国主义联軍以屠杀焚擄的残酷手段扑灭了北方义和团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占領了中国首都北京，但終于不得不承認中国人民是不可被征服的，因而感到利用清政府作为間接統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是既省力而又唯一可行的方法。它們在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就范之后，就轉而积极支持这个反动政权。同时，清政府对外不能进行抵抗，对內又害怕人民的力量發展起来危害它的統治权，就悍然不顧地采取卖国投降的外交政策，和帝国主义一道，残酷

地镇压本国人民。

自从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以来，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农村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全国成为帝国主义工业品的倾销市场，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贫困和破产。这些痛苦的事实唤醒了中国人民：要救中国必须打倒帝国主义，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首先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封建王朝。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双重政治任务。

在帝国主义加紧武装侵略与国内革命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清政府选择了“宁亡于外寇、不亡于家奴”的卖国投降路线。从一九〇〇年以后，它对帝国主义采取了有求必应和来者不拒的态度，甚至主动地求助于帝国主义以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和一切爱国救亡运动；对外赔款和丧权辱国的一切损失，都转嫁在人民身上，皇帝和贵族却仍然作威作福，搜刮民脂民膏，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

由此可见，当时帝国主义已从打击清政府转变到利用清政府，清政府已从盲目排外转变到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封建王朝在反人民的共同点上已结合起来了。

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化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总目标是完全相同的，但它們相互之間又有矛盾。因此，它們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有些时期，彼此結成一伙来对付另外的一伙，有些时期，由于利益一致成立了联合侵略阵线。帝国主义之間的主要矛盾存在于从南方侵入的英国与从北方侵入的帝俄之間。英国刚开始是与法国結成一伙的，但因法俄有同盟关系，而帝俄对东北和华北的野心很大，英国就找到日本代替法国作为抵制帝俄和侵略中国的得力助手。美国对中国虽以伪善者的姿态出现，但也企圖利

用日本作为进攻中国和侵略亚洲的跳板。因此，英、美、日三国所形成的一伙与俄、德、法三国的一伙互相对立。这种对立情形，曾经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的一次战争，就是因三国“干涉还辽”引起的日俄战争^[1]。但自日本战胜帝俄后，它又脱离美国而成为美国在满洲问题上的主要竞争者。由于这一形势的演变，促成了日俄两国的结合，后来在对华借款问题上，形成了以日俄为一方、英美德法为一方的两个对立阵线，最后又形成了共同分赃的联合阵线。由此可见，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以眼前利害来决定的，既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

美国侵入中国较迟一步，因此它在中国舞台上扮演了最阴险的一个角色。它经常地躲在各帝国主义的后面，教唆它们侵略中国，有时它自己也用冷拳暗箭来伤害中国，但当中国受到一定打击的时候，又以“第三者”的伪装姿态向中国表示“善意”，使昏庸懦弱的清政府钻进它的圈套，心甘情愿地通过它的“调停”，接受直接侵略者所提出的十分苛刻的条件，而它就乘机提出“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要求来，轻而易举地享受到与直接侵略者相同的侵略果实。^[2]

以上就是北洋派产生初期的国外情况。

甲午战败是清政府末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此之前，清朝统治阶级具有顽强的自大心理和排外感，认为中国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对于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新事物都不愿看上一眼，更谈不到研究和吸收；而在此以后，这个思想武装解除了，没奈何，只好承认自己连个“小日本”也赶不上，但并没有真正了解其中的原因。这是由自大心理转化为自卑感，排外心理转化为盲目崇拜外国的具体表现。

在此之前，中国人民的各项爱国主义运动都是散漫的、自发的；而在此以后，逐步地形成了自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出现了兴中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和强学会所领导的君主立宪运动。

在此之前，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虽然中国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帝国主义侵略，但是清政府还没有感到亡国的危险。由于太平天国的消灭，曾经替清朝出过死力的湘军、淮军也都陷于“兔死狗烹”的命运而消亡了，清政府仍然极力培养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仍然采取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以及其它种种愚民政策，使人民继续停留在文弱萎靡的境地，以利于巩固其君主专制统治。但在此以后，清政府鉴于打败中国的是一个靠近中国的亚洲国家，而这个国家又是一个新兴的小国，就不能不感到亡国的严重威胁。此时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还没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全国人民到处发出“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吁，这种要求已非任何方法所能抑制。为了加强对国内人民的控制，清政府也不得不从事于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新型陆军。

在此以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还甘心“埋首书城，磨穿铁砚”，接受科举制度的愚弄；而在此以后，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经改变了，弃文习武的新风气已经弥漫全国了。

以上就是北洋派产生初期的国内情况。

二 袁世凯小站练兵，袁手下的“北洋三杰”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即中日战争结束后的一年，清政府开始了建军工作。它分批派送“可靠”青年出洋学习军事，并在国内各主要城市设立各级军事学校，如武备学堂、讲武堂、干部学堂、陆军小学等，以培养新军干部和军

事教育人材。它准备逐步訓練新軍以代替旧軍，首先在北京附近訓練新軍。

清政府的建軍工作，为三十七岁的袁世凱开辟了一条取得政权的捷徑。

袁是淮軍軍閥袁甲三的侄孙。一八八〇年，他援引世誼到山东登州投效庆軍統領吳長庆，庆軍就是淮軍的一个支系。一八八二年，随庆軍到朝鮮，吳長庆叫幕僚南通名士張謇教他的詩詞和八股文⁽³⁾。一八八四年，吳被調回国，直隶总督李鴻章就派袁接統慶字營。一八八五年，中日两国議定双方在朝鮮撤兵，袁以駐韓商务委員名义仍留朝鮮。他在朝鮮干过些好大喜功的事，对国家無利而反有害。一八九四年中日戰事發生之前，他才撤退回國。

这个与淮軍具有密切血統关系的野心家，最善于逢迎当权人物，先后打通了汉族大臣淮軍首領李鴻章、西太后亲信李蓮英，滿族大学士榮祿、軍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門路，得以浙江溫處道的头銜留在小站，主持訓練“新建陸軍”。

小站是天津、大沽間的一個小鎮。淮軍曾采取屯田法在此駐軍二十多年。此时直隶总督为王文韶，淮軍早已涣散，清政府派长蘆盐运使胡燏棻在此訓練定武軍，聘德国人汉納根担任教官。胡不久被調为蘆汉鐵路督办，清政府派袁接統定武軍，改名为“新建陸軍”，并将原有的四千余人扩充为七千人。

袁組織了“新建陸軍督練處”，請老朋友徐世昌担任參謀，唐紹仪担任文案⁽⁴⁾。又請天津北洋武備学堂总办廢昌⁽⁵⁾推荐軍事人材，廢昌推荐了武備畢業生馮国璋、段祺瑞、梁华殿、王士珍四人⁽⁶⁾。

封建时期的旧中国，是“文人万能”的时代，文人帶兵是

一件“合理”的事情，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流就是以文人而为军事统帅的。袁当然也是个文人。由于他在朝鲜玩弄过“实力政治”，回国后又请人写了一部“兵书”，用他的名字刊行，以此博得“知兵”之名，并取得训练新建陆军的职权。但是，训练新军和统率旧军的任务和性质显然不同，如果对新的军事知识一窍不通，就不能担负训练工作。因此，在清政府建军的旗帜下，各省督抚争先恐后地从各方面网罗军事专门人材充当练兵机构的幕僚长，授以主持练兵的实际责任，而本身仅拥一个机构首长的空衔。袁所找到的幕僚长不是军事专家，而是善于诗词歌赋的翰林公徐世昌，这是他与各省督抚的不同之点。

当然，他所找到的几个武备毕业生不能不算是军事人材。他和他们一见面，就立刻委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王士珍为工程学堂总办兼工兵统带。这三个不同兵种的学堂都是随营军事学校，并且都是短期速成的性质。袁既要他们主持军事教育，又要他们做带兵军官，就显得袁所吸引的军事人材是为数甚少的。而这几个寥寥可数的军事人材也不是合乎标准的军事人材，因为北洋武备学堂仅是清政府的一个装饰品，从这里培养不出优秀的军事人材来。

随后王、段、冯三人就得到“龙”、“虎”、“狗”三个绰号，并且被称为“北洋三杰”。

除北洋三杰外，袁从两方面物色军事干部，一方面继续向北洋武备搜罗，另一方面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新建陆军中所谓小站旧人，有王怀庆⁽⁷⁾、段芝贵、曹锟、陈光远、张怀芝、卢永祥⁽⁸⁾、雷震春、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⁹⁾等；受

袁节制和训练的旧军将领有姜桂题^[10]、张勋、倪嗣冲等。

用出身行伍的老兵老将来做干部，这仍然是旧军所采取的方法。他们不能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完全没有新的军事学识，因此，由他们训练出来的新军，在其实质上仍然是旧军。只是挂上了一个新军的招牌。但是，袁认为这些老兵老将的脑筋比较简单，对上级能够盲目服从，比那些喝过海水的洋学生来得“忠诚可靠”。由此可见，袁在干部问题上是要奴才而不重视人材，其练兵目的是为了培养个人武力而不是用以救亡御侮。

这个时期，清政府出现了守旧派和维新派，这两派的政治斗争日益尖锐化。袁一方面加入了康有为的强学会成为一个“维新志士”，另一方面又以新建陆军的隶属关系，极力逢迎直接领导者新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著名顽固守旧分子荣禄，从而取得他的信任。

三 袁出卖君主立宪派取得西太后的信任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推倒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口号。第二年十月，回到香港、广州一带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但因偷运手枪六百余支被海关查获，在牺牲几个同志之后，孙中山经由日本到檀香山，第一次的革命活动就完全失败了。

一八九五年，康有为以举人资格进京会试，写了一篇“上皇帝书”，请求变法维新，并邀请各省进京会试的举人签名，一时签名者竟达一千三百余人。这是当时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

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治运动，在当时都是新的呼声和新的旗帜。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其明显的鸿沟，前者是主

张打破现状的民主革命派，因而被称为革命党或激烈派，后者是主张维持现状而加以某些改革的改良主义者，因而被称为君主立宪派或温和派。这两派的方针目的不同，前者要摧毁旧的机构，改建民主共和，认为必如此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后者则认为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同样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且认为进行革命斗争将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它们的活动范围和发展对象也不同，前者只能在国外活动，后者则能在国内公开活动；前者在组成初期只得到海外华侨和国内极少数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参加，后者却得到国内大官僚、大地主、上层社会人士的支持。

一八九六年，孙中山在伦敦一度被清朝公使诱捕。一八九八年，他由伦敦到东京开辟新的革命阵地，但是附和他的人还是很少。同一时期，康有为在北京先后组织强学会、保国会，更多的达官贵人参加了这些组织，他的门徒梁启超、麦孟华等在全国各大城市创立学会、开办报馆，虽然也受到一些极端顽固派的“鸣鼓而攻”，但是支持他们的上层社会人士越来越多，竟能在国内建立一道“变法图强”的思想战线，逐步地影响到清政府的最上层。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了变法维新的“上谕”。

光绪帝是一八七五年登基的。那个时候，他年仅四岁，由嗣母西太后垂帘听政。直到一八八九年十八岁时，西太后才把政权交还给他。但这只是名义上的交还，事实上遇有国家大政和任免二品以上大员，还必须向她请示才能决定。光绪帝准备提拔君主立宪派为推行新政的骨干，又怕顽固守旧的嗣母不答应，所以初步只能做到提拔康党杨锐、

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四品京卿。

那时清政府的最高机构为“军机处”。所谓军机大臣以满族为最多，汉族军机大臣只是朝廷中的一个装饰品，不能参预国家的机要大事。自从皇帝身边增设四个京卿以来，这个情形才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京卿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代皇帝批阅奏章，向皇帝提供处理意见，就像后来的机要秘书一样。有了四个京卿，军机大臣就都成为朝廷中的装饰品了。当然，如果新政推行下去，还必须继续不断地提拔新进青年来代替衰朽旧臣，这不但会影响旧臣的权力，而且必然也会影响旧臣的地位。随着新政的进展，西太后的权力也将日益减削。因此，新政与西太后及亲贵大臣们的切身利害发生了严重矛盾。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光绪帝所提拔的都是汉族青年，因此又由新旧之争进而牵涉到民族偏见。满族大臣想抬出西太后来压倒光绪帝，便抓住了这个题目经常地在西太后面前诉苦说：“皇帝喜用汉人，我们都快要站脚不住了。”用民族界限来代替新旧界限，这种说法是具有更大的煽惑力的。西太后对于光绪帝推行新政不请示而行正在生气，又经满族大臣搬弄是非，她的气就更大了。她决定借十月（九月）到天津阅兵的机会，指使她的亲信荣禄举行一次宫廷政变，当场扣留光绪帝，另立一个幼君，以便于自己再临朝听政。

光绪帝得知这个密谋，想通过四个京卿加以挽救。谭嗣同错误地把袁世凯当作新党同志，又因新建陆军驻防天津附近，认为近水能救近火，因此授意光绪帝加授侍郎衔以示惠于袁。他自己就在半夜里冒冒失失地去见袁，叫他带兵到天津先杀荣禄，然后进京包围颐和园把西太后软禁起来，以